

關於“西学東漸”与近代日中欧語言
接触研究的方法

内 田 慶 市

『中国学志』 否号（1998年2月） 抜刷

關於“西学東漸”与近代日中欧語言 接触研究的方法

内 田 慶 市

0 前言

我近年来主要研究“西学东渐”与语言的关系，特别是近代中国人在“西学东渐”这个大潮流中怎样接受“新生事物（=欧美的以科学技术为其中心的近代文化）”，怎样把这个“新生事物”容纳上自己的语言里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近代中国人怎样把“新的概念”反映在自己的语言里，怎样创造“新的词汇”。

这个时代的词汇跟其以前和以后的词汇比较起来，确实是划个时代的。现代汉语里面的许多表达抽象概念的词汇，如哲学、科学方面的词汇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词汇的基础上发展、稳定的。

有关“近代词汇史”上的“近代”的分期问题，以前沈国威先生提出过（1994）。他认为以鸦片战争（1840）为“近代语”的开头，他又把以后的阶段分为两段，就是以从1840年到1895年为“近代前期”，从1895年到1919年为“近代后期”。他又指出“近代后期”是大量的从日本来的借语流入时期。我看这个分期问题以后还要继续讨论，特别是我认为可以把“近代前期”再分为两段，就是日本的影响比较稀薄的时期（明治维新=1868以前）和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的日语开始进入的时期。

1 “西学东渐”的主要旗手 - 近代来华传教士

近代中国的“西学东渐”的具体的现象表现在有关近代欧洲的科学技术的书籍的翻译、出版事业。这个翻译、出版事业的主要旗手就是来华传教士。我们可

以说是近代中国的翻译，出版事业随着基督教的传来开始的。当然他们在近代中国的教育、医疗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他们的主要目的就在传教，但是他们为了这个目的，要用很热情的、灭私的精神来闯过语言、文化习惯的障碍，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把西洋的文化传达给中国人。

这个时代的传教士既是传教士，又是优秀的语言学者。他们的主要著作除了《汉译圣经》以外，还有英汉·汉英字典、汉语课本、汉语语法书等等。他们的汉语水平相当高，相当可靠的，特别要指出的是，因为他们不是中国人，他们可以通过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汉语的对照，用外国人的观点来客观地描写汉语的现象。他们的著作里面可以看到本国不能发现（就是本国人算成理所当然）的各种汉语特征的描写。（参看内田庆市1991）

中国的有系统性的语法书就是1898年出版的《马氏文通》，但是他们早就以前强立了汉语语法理论，如马礼逊的汉语语法书。他们又已经发现“官话”有“北官话”和“南官话”、“西南官话”等的区别。如《意拾喻言》的序言或者狄考文、艾约瑟的著作。还有他们用罗马字标音，这是对于汉语语音史的研究很有用处的。

2 传教士的翻译观 - 马礼逊的翻译观和《伊索》东渐

从现象来看，“翻译”是把别的语言的词汇代替自己的语言里的词汇。

语言跟别的表现，比如音乐、绘画等一样都是人的表现之一。语言的背景应该有人（说话者）的存在，这是不可缺的。某个语言的词汇就是使用这个语言的民族的“认识”的集合。换句话说，语言就是人的认识的表现，是反映民族的思维方式、文化的东西，又可以说语言就是文化。

如果把语言看成这样的东西，翻译不是上述的那样简单的。

在这样的语言观的立场上来看，翻译不是单纯的词汇的代替。翻译的“等价”不是看得见的“形式”，而是看不见的“价值”，这个价值是把某个民族的“思维”、“文化”集合或者抽象的东西。翻译这时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，也成为文化的问题，又是文化接受的态度、方法的问题。

近代来华的传教士他们认真地专心地从事这个工作。他们把圣经翻成汉语的时候，很拘泥，很讲究译词的问题，比方说“神”和“上帝”的问题，或者用什么文体（比如：文理、浅文理、白话、方言）来翻译的问题等等。如看〈传教士大会记录（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1850）〉。

《圣经》里面有“面包”、“葡萄酒”的概念，但是他们没有使用这样的词汇（虽然这样的词汇那个时期已经存在的），而用了“饼”或“酒”等词汇。他们为什么没使用“面包”或“葡萄酒”呢？这样的问题，应该理解传教士的翻译观，才能解决。特别这里值得指出的是马礼逊的翻译观。

2-1 马礼逊的翻译观

马礼逊的翻译观表现在《英华字典》（1815 - 1823）的序言里面。他的基本态度或者前提是这样。

a 对方（就是中国）是异质的文明。

这不是侵略者的态度。他确认对方也有他自己的文明。

b 译词应该考虑到他的语言（就是汉语）里使用时的意思。

这是对于对方的语言的“谦虚”的态度，就是考虑到在对方的文明里的意思。

总而言之，马礼逊的对翻译的态度和方法不是把自己的文化强迫对方接受的，而是尽量把自己靠拢到或者同化为对方的文化、思维方式的。

他按照这样的态度来采用的“奇怪的文理（=浅文理）”就是《神天圣书》的文体。他的《神天圣书》的文体的特征如下面。

(1) 连词、代词多用

(2) 量词多用

- (3) 使用时态助词“了”、“着”、“过”
- (4) 白话介词多用
- (5) 使用可能补语，趋向动词

这就像是《三国志演义》那样的又“达”又“雅”的文体。

2-2 《伊索》东渐

在中国第一次翻成汉语的《伊索寓言》是金尼阁的《况义》。后来1840年出现了《意拾喻言》。这是英国人罗伯聃（Robert Thom）翻译的。

这个《意拾》后来也在《遐迩贯珍》等报刊上连载过，又传到日本出版。只是日本翻刻的书名不是《意拾》，而是《伊苏普》或者《伊娑菩》。

这个说明日本传来的《伊索》也许经过麦都思等的改编。因为《遐迩贯珍》上转载的时候被改为《伊娑菩喻言》（《遐迩贯珍》第一号），还有《伊娑菩》这个语音不是按照广东音，就是反映没有“入声字”的地方的语音。

日本江户时代末期（1862年），江户幕府派遣高杉晋作等到达上海。那时高杉等拜访麦都思那里买回各种书籍，比如《数学启蒙》、《代数学》、《地理全志》、《联邦志略》、《新约全书》、《六合丛谈》，还有《伊娑菩喻言》等等。

这个《意拾喻言》的语言、文体也有特色的。基本上跟《神天圣书》一类的特征一样。一部分是文理，一部分又是白话。正是半文半白的文体。

特别感兴趣的是每个故事的开头部分，还有最后的教训部分。

比方说，《兔子和龟》的开头部分这样开始。“禹疏九河之时、”。别的故事也一般都变成中国式的。比如“盘古中”、“山海经载”、“大禹时”、“神农间”、“罗浮山下兰若幽楼”、“峨眉山下”、“齐人有一妻一妾”、“无稽村外”等等。教训部分也是这样。如“渔人得利”、“论语云，小不忍则乱大谋”、“刘备借荆州，有借无还”、“江山易改，性格难移”、“经一事，长一智”、“助虎添翼”等等。

还有西洋的人物也改成中国人，如把“Diana”翻成“嫦娥”，“Hercules”

翻成“阿弥陀佛”，“jupiter”翻成“北帝”等等。

这个《意拾》的翻译方法可以说是反映有意志地把自己同化为中国文化的倾向。这个《伊索》跟中国人翻译的《伊索》（比如，林纾的《伊索寓言》）有所不同。

我们关西大学增田文库里收藏有很多这个时代的“西学东渐”方面的书籍，有一本书叫《东方伊朔》。

这是1906年上海美华书馆出版的，由中国人传教士陈春生编的。这个《伊索》完全都是中国的故事，有时引用《圣经》的故事。里面有“留声机”、“铁路”、“德律风”、“照像法”、“电报”、“透物光”等词语。我认为这个《伊索》是马礼逊的翻译观的终点，就是马礼逊翻译观的“升华”。这是传教士的有意志的有自觉的“自己同化”的完结。这样的传教士的态度正是给中国人留下了基督教的深刻的影响。

3 “西学东渐”的另外一个路径 - 从欧洲开、经过日本、到达中国

上面已经说过，“西学东渐”的主要旗手是来华传教士，还有一部分洋务、变法派的觉醒的中国人。但是实际上说，日本或者日本人一定程度上也起个作用。

其实“西学东渐”还有另外一个路径，就是欧洲开，经过日本、往中国的路程。

3-1 近代中国的译书机构

鸦片战争以后，在中国开办的翻译、出版机构如有“十大译书机构”（熊月之1989）。这些都是跟教会有关关系的，而且集中在上海。

其中最出色的是“江南制造局翻译馆”，这是以傅兰雅为中心人物的“中西协同”的出版机构。对于翻译馆的翻译方法，我们在傅兰雅的《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》中看得出来。

这个翻译馆除了徐寿、李善兰等中国人以外，还有一个日本人叫藤田丰八。关于藤田的工作，熊月之先生也曾经提出过。但是，还有很多地方不太清楚。日本方面也有研究，可是一般都是在中国教育方面的贡献或者围绕跟王国维、罗振玉的关系的研究。

藤田还在《农学报》上翻译过很多农学方面的著作。藤田在翻译馆里起什么作用，给翻译馆留下怎么样的影响，这些以后还要继续研究。

3-2 向“东文”的倾斜

甲午战争以后，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显然的倾向，就是向日本学习，依靠“东文”、“东语”（=日语）接受欧洲的近代文化的倾向。比如看《译书公会章程》、康有为的《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摺》、张之洞的《劝学篇》、梁起超的《论译书》等等。他们都认为日语比欧洲语言靠近汉语，容易通晓，汉字也一样。这可见他们的认识内有“同文同种”的意识。

这样重视日语的倾向具体地反映在《东西学书录》。

《东西学书录》是1899年由徐维则编的，然后1902年出版了《增版东西学书录》。

这里面包含着很多日本书的翻译。

实藤惠秀、谭汝谦编的《中国译日本书籍综合目录》上指出日本书籍的翻译从1900年、特别从1905年以后激增。但是我看来已经从《东西学书录》那个时期开始增加。比方说，《增版》第一卷到第四卷里面增加了141种的日语书的翻译（总数是196种）。这些日语书的翻译者有刚才提过的藤田丰八，还有古城贞吉、田冈佐代治、中江笃介等等。

这样的倾斜日语的情况当然给汉语予很大的影响。如《译书经眼录》的记述那样。

4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资料

“西学东渐”与言语的关系最鲜明地表现在“专门用语”上。比如“科学技术”方面的词汇、地理用语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等词汇。这些都是原来中国没有的，随着“西学东渐”从欧洲传到中国来的“新生事物”，而且都是当时的中国人最需要的东西，所以要创造新的词汇。

但是“西学东渐”还带来了许多新的日常用品，如食品、交通工具、药材、首饰、衣服、房什等等。

关于“专门用语”的研究已经有相当的成果，如沈国伟先生的一系列著作、荒川清秀先生的地理学用语的研究等等。相对来说，日常用语的研究好像不太多。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这个“日常用语（常用语）”方面词汇的演变（诞生、变化、发展）。

“日常用语”跟“专门用语”比起来，相当“保守”的，不容易弄清其变化。但是荀子说过“名也者，所以期异实也”。这个时代传来的“日常用品”等也有一定的新的名称，肯定有一定的特征。

对这个方面的研究有益的资料如下面几种。

(1) 《汉译圣经》

我们要提到的不是有关宗教的专门用语，而是《圣经》里面的很多日常语，如“饼”、“酒”、“黄油”之类的东西。拿一个例子，《古新圣经问答》（1862）里有一个“火车”这个词汇。

“如厄里亚，为罚恶人，祈求天主，三年半不下雨，还行许多奇妙的大圣迹，后来坐一火车，登空而去”（第十一段）

这个“火车”当然不是现在的“火车”，但是“火车”这个词汇确实这个时代已经存在的。

《汉译圣经》还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可以用来鉴定“非日语借词”的。因为

关于“西学东渐”与近代日中欧语言接触研究的方法

《汉译圣经》一般来说没有日语的影响，专门给日语予影响。如“自由”这个词汇已经在麦都思的圣经里，所以这不是日语的借词。

(2) 英语课本（英语词汇·会话集）

清末出现了一些英语课本，如《华英通用杂话》（罗伯聃1843），《增订华英通语》（这是1860年由日本福泽谕吉增订的，原本却是1855年前后由广东人子卿编的），《英语注解》（1860年前后，冯对山等编的），《英语集全》（1862，唐廷枢），《英字入门》（1874，曹骧），《英字指南》（1879，杨勋）等等。

关于这些英语课本的重要性，周振鹤先生也曾经提过（1996）。

这些都是相互影响的，体裁也差不多。英文用汉字标音，词汇有分类，所收的词汇大部分是贸易方面的，比较常用的词汇。这些课本都用（a（英语）是b（汉语））这样的解释法，这个b（汉语）应该是众人所周知的词汇，又是比较固定的词汇。我们还可以从这些课本里头看到一些词汇的演变。如“黑茶”到“红茶”，“通事”到“翻译”等。只是要注意这些课本都是依靠“南方方音”、“南方方言”写出来的。如《华英通用杂话》说明这是用“正音”来注音，但是当时的“正音”不是“北京官话”，是以“南京方音”为主的“南方音”。如用“士”来表示“s”，用“及”表示“k”，“生”来表示“sun”，“英弟也”来表示“india”等等。语法、词汇上面也有一些南方方言的特征，比如“洗面盆”、“照面镜”、“晓得”、“剃发刀”。

这些课本出版的时期都是1840年代到1880年左右，这个时期正是日语的影响比较稀薄的时期，所以我们又可以把这些资料用为鉴定非日语的一个标准。

(3) 英汉·汉英字典之类

英汉·汉英字典的重要性不要说的，马礼逊、麦都思、卫三畏、罗存德等外国人编的字典当然要使用。我们还要看中国人编的字典。特别是“商务印书馆”

的一系列的英汉字典很重要的。我们从中国人编的字典里面可以看到中国人怎样接受新的词汇，怎样排除新的词汇，怎样固定新的词汇这样的过程。

商务印书馆的第一部汉英字典是1899年出版的《商务书馆华英字典》（按照邝其照的《华英字典集成》）。然后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汉英字典。

这个时期正是碰在汉语开始受日语的影响时期。

这些字典里，除了邝其照的字典以外，还有《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》（1902），《英华大词典》（颜惠庆1908），《综合英汉词典》（1927）这三种比较重要的。

邝其照的字典大概受到麦都思的字典的影响。《华英音韵字典》根据罗存德的字典编的，但是还有纳韬耳、韦氏和一些日本字典的影响，《英华大词典》也有纳韬耳、韦氏和日本的影响。

《综合》又是划一个时代的字典。以前的一般都是以韦氏为主的，但是《综合》就是韦氏以外还参考牛津、century、stanford、日本各种词典而综合每个优秀的地方，所以起名叫《综合》。

我曾经笼统地调查过一些词汇。（参看内田庆市1995b）

我们可以某个程度上确认沈国威先生以前说过的“英汉字典”和《汉语外来词词典》认定的日语借词之间的差异。沈（1994）的差异是如下。

- (a) 日语的译词和罗存德的一致的
- (b) 不完全一致的，但是有些关系的
- (c) 跟日语的译词没有关系的

我们可以看到(a)类比较稳定，其他也有一些渐渐地受日语的影响，然后有的词汇在汉语里面固定，有的词汇被淘汰的过程。

现在举一个有兴趣的例子。“自行车”这个词汇没有出现在商务的字典里。这个时代已经有自行车这个交通工具，如在《沪游杂记》（光绪二年）等有自行车的记述，但是直到1936年的商务字典也没有收进这个词汇。“自行车”早就出

现在《诸器图说》里面，但那个“自行车”是“自动行路的车”（今天的汽车）的意思。《综合》里有“自转车”。这是《综合》受到日语的影响的结果。

(4) 报刊、旅游记、出使记，条约集等

华字报纸（如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》《遐迹贯珍》《察世俗》《六合丛谈》等），中国人的外国旅游记、出使记，还有条约集、贸易记录等也是可供研究的资料。如李圭的《环游地球新录》等很有价值。这里面有很多万国赛会出品东西的词汇等，我们从那儿看出新的词汇。

除了上边说的资料以外，还有外国人学汉语的汉语课本、翻译书之类也当然很有用处的。

最后我想提到日本学者很早以前重视这个方面的研究。比如鱼返善雄1941年早就指出应该重视外国人的汉语研究，太田辰夫也在1951年写的《关于清代的北京语》里用过很多所谓“欧文资料”（他已经在这个论文里说到罗伯聃的著作）。

我们以后要继承前人的成果，在这个前人的基础上更加发展这个方面的研究。但是资料很多，一个人的能力有限，应该要跟同行进行共同研究。

〈付记〉

本文原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办的〈汉字圈近代学术用语的形成和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〉（1997. 2. 20）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〈西学东渐与语言交流学术讨论会〉（1997. 8. 27）上宣读过的。该会上得到同行们的很多贵重的意见，在此表示感谢。这次转载时做过一些修改。

〈参考文献〉

- 沈国威 1994 《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》（笠间书院）
熊月之 1994 《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）

- 内田庆市 1991 〈《华语拼字妙法》的音系 - 南京官音的一斑〉 (《中文集刊》第3号)
- 内田庆市 1992 〈“官话”研究的《汉译圣经》的可能性〉 (《关西大学文学论集》第4卷 - 第3号)
- 内田庆市 1993 〈《汉译圣经》的可能性〉 (《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报》第56号)
- 内田庆市 1994 〈伊索东渐〉 (《泊园》33号)
- 内田庆市 1995a 〈伊索东渐补遗〉 (《关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纪要》第17号)
- 内田庆市 1995b 〈商务印书馆《英华字典》的系谱〉 (《关西大学文学论集》44卷 - 第1 - 4号)
- 内田庆市 1995c 〈从欧洲开 - 经过日本 - 开往中国〉 (《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报》第61号)
- 内田庆市 1997a 〈从欧洲开 - 经过日本 - 开往中国 “西学东渐”的另外一条路程〉 (《浙江与日本》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国际共同研究丛书1)
- 内田庆市 1997b 〈清国英语事始〉 (《关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纪要》第18号)
- 周振鹤 1996 〈鬼话·华英通语及其他〉 (《读书》3)